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九期 ——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2b)

【追根溯源】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	佚 名
【历史见证】大兴屠杀调查	遇罗文
【研究报告】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革屠杀	一 平
【动态报导】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文革”摄影展览和画册编辑追记	江 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追根溯源】

红卫兵为什么那么残暴？

• 佚 名 •

好多学者争论，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问题可复杂。包括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为什么老百姓那么积极的投入？为什么红卫兵那样狂热？

有的问题对过来人不算问题，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比方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弄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就像老故事里说的，母亲从小一遍遍的告诉儿子长大了可要报血海深仇呀。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仇人，当儿子的还能干别的吗？非上去往死里打不成。

残忍是教出来的，从小学就参观各类展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知道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的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

经地义的。谁都没告诉我们那大部分都是编的，即使少有真实部分也只是一小部份地主国民党才坏成那样，刘文采没那么坏、也根本不代表所有地主。这一忽略能造成多可怕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要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教育的一门心思想着打坏蛋干革命可不是三五天就能见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常听老贫农老工人的忆苦报告。他们准都经过培训，因为好些句子每个报告里都有，象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凡地主资本家财主没一个好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意思是穷人受了害别希望靠讲理找回公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只有穷哥们还能帮一把，“来了救星共产党”，接着就是穷人怎么打地主分田地了。

每次听完报告就得写作文，然后老师就表扬谁的作文好。好作文全都是“满怀阶级感情”，证据一般是：“当我听到杨奶奶万般无奈拿孩子换了二斗麦子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谁不想受表扬呢？于是我打定主意下回也哭。不过这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哭，从上小学连我爸爸揍我都不哭，越揍越瞪眼。这回为了受表扬必须努力。等又听忆苦报告时，我拼命使劲，听到“地主逼债，卖孩子，要饭挨狗咬”，确实有点难过，可就是流不出眼泪。心里可越来越急，快到“来了救星共产党”了，那可就不能哭了，这回的作业又要完了。终于，我连着急带难过挤出了两滴眼泪。然后呢，必须让同学看见，好作见证。于是我向左转头，左边的同学泪流满面，根本不看我，再向右转，右边的同学也闪着泪眼只往前看，于是回头，后边的怎么也免不了看我一眼吧。等报告完了，我正高兴的构思作文，就听老师说：“今天全班同学都很好，只有个别同学不认真，东张西望”，说着还狠狠地盯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凉：完了，又完了。

除了请老贫农老工人作忆苦报告，还让我们自己回家受教育。有篇作文“我和爸爸比童年”。我来的快，没十分钟就想好了。爸爸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还常挨打，后来爸爸参加了八路军，把狗地主抓住枪毙了。这故事有点太熟，好像听过。不过没关系，天下地主一般黑，天下穷人也差不多。我对构思很满意，只等爸爸点头认可就能落笔成章。找着爸爸我开门见山：“爸，你小时候净吃苦吧？”这我有把握，爸说过不只一回，他小时候常受罪。果然，爸爸说是。我马上切入正题：“你给地主放牛尽挨打吧？”。爸爸纳闷，说他没放过牛。我有点喘不上气来：没放过牛？那我的作文怎么办呀？爸爸又说放过几天羊。我这才缓过来：羊是小点儿，可也凑合了。赶紧问：“地主尽找茬打你吧？”爸爸更糊涂了，问哪个地主，干嘛打他呀？“嫌你放羊没放好呀”！爸爸还不明白，说“谁打呀？羊是自家的”。我眼珠子快瞪出来了：什么！自家有羊？穷人都是吃糠咽菜，全家盖一条破被子，怎么能有羊呢？我缓缓神质问爸爸：“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净吃苦吗？”爸爸说是啊，那会儿过年才吃顿白面，平常连玉茭子面（玉米面）都吃不上，净吃山药（白薯）。我更是又气又急：那么好吃的白薯，我想吃都吃不上，他净吃还说是苦？！我绝望中想起：“你不是说你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你打过坏蛋吧”？我琢磨着：给地主放牛那段就算了，就从爸爸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写吧。可爸爸说他在地方上不在部队上，没打过仗。什么叫“地方上”我不大懂，可还不死心：“那日本鬼子来了呢”？我心说，见了鬼子你该打了吧？爸爸说鬼子一扫荡他们就钻山沟。“埋伏起来打”？“钻到山沟里藏起来，叫鬼子逮不着”。啊？！见着鬼子不打，藏起来怕鬼子逮着？！我气得快哭了：这也叫参加革命？完了，完了，挺好的作文全让爸爸给给毁了。

我还抱着希望问了妈妈，“我和妈妈比童年”也行吧？可结果更糟。妈妈说她曾考上了开封女一中，名校，她爸爸，就是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姥爷，可高兴坏了。我心里真紧张，旧社会什么人才能上中学？这姥爷别是地主吧？妈妈说她爸爸是商人：我赶紧琢磨：好人有共产党，红军，八路军，老贫农，工人……，坏蛋呢，有国民党，日本鬼子，地主，资本家，哎呀，有当铺掌柜的，这是商人吧？妈妈又说她爸爸是买卖药材的。我略微松口气：坏蛋里好像没听说有卖药材的。妈妈接着说开了，说她在开封有段好日子，她爸老去看她，给她买好吃的，有酱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妈妈回忆的挺高兴，没发现我有多么迷惑多么难过：在万恶的旧社会，

什么人才能猛吃牛肉呢？就连“比蜜还甜的新社会”里也不行呀，我就特爱吃酱牛肉，可一年也见不着几回，而且每次刚吃到更想吃的时候就没了，从来就没有过“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爸爸妈妈说的和课本里，广播里，老工人老贫农还有老师告诉我们的太不一样了。哪个对哪个错明摆着！我为有如此可疑的爸爸妈妈而心情沉重。

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已经装满了一脑袋的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北京，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可疑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等我们去搭救了。可有一样不明白：咱毛主席怎么还不发命令呢？

我们班上大个子同学刘力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消息：快跟美国打仗了！我们激动得瞪眼：是吗？！刘力一脸的得意：“对美国的严重警告不是快到500次了吗”？那会儿美国飞机老爱侵犯中国领空，侵犯一次中国就宣布一次严重警告。刘力说：“一到500次就要和美国开战了”！我们高兴坏了，比盼过年还急的盼着美国飞侵犯领空。终于有一天，严重警告500次了！可是没开战。我们一肚子的气质问刘力。他的脸都急红了，小声说好像又改1000次了。我们顿时失望的要哭：1000次？还得多少年呵？有个滑头滑脑的同学张小丁说他知道为什么不和美国开战为什么不解放台湾。我们赶紧问为什么，他小声说美国有航空母舰，还有第七舰队，特厉害。我们全不同意：解放军用木船都能打败军舰，电影里都演了。张小丁却不服，说航空母舰有飞机有导弹，比鱼雷快艇厉害多了。我们全都不信。可张小丁还冷笑着说是。刘力一瞪眼，说那咱们试试，你当航空母舰，我当鱼雷快艇，看谁厉害？话没说完就一下把张小丁的胳膊狠狠的拧到背后，疼得他直冒眼泪赶紧求饶。我们全都心满意足：还是鱼雷快艇厉害。

那是1962，1963年，蒋介石闹着反攻大陆。福建前线捷报频传。炮轰金门，抓美蒋特务。连小学生也参战，他们的故事上了广播和电影，叫“英雄小八路”。我们羡慕得要死，特别恨蒋介石不往北京派特务。当然我们也知道到处都有坏蛋，不光是特务，还有阶级敌人，比如掐死少先队员刘文学的狗地主，我们一边惋惜刘文学一边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狗地主能留到今天呢？当初全打死不就没事了吗？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瞪着眼到处找坏蛋。一天上学的路上有个半疯的老太太碰着背书包的就问：“小同学，你在哪上学呀？学校在哪呀？”平时可没人这么问，刘力觉得“有情况”：这儿的人都知道学校在哪，她怎么就不知道呢？是不是特务？我们立刻觉得像：那老太太三角眼，还有大金牙，真像特务啊！于是我们跑到学校一起向老师报告，然后都盯着他，就给一个字“抓”。张老师很严肃地想了半天，说同学们的警惕性很好，……咱们先上课吧。我们失望极了。

除了恨坏蛋，我们也爱人民。对敌人像冬天那样严酷，对人民像春天般的温暖。这可是雷锋叔叔说的。

有一天早上，还没开校门呢，门外像往常一样等着一大群学生。突然来了位老太太，虽然还是老太太，可一没三角眼二没大金牙，戴着个旧草帽，领着个小女孩，她们都穿的破破烂烂。那是困难时期，我们的衣服上也常有补丁，屁股上补个大圆或半圆，膝盖上也补两大块。可这老太太和小女孩的衣服上补了就太多了，数不清。还什么色的都有。这种人当时的北京不多见，大概是从农村来的。我们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两个字：穷人。老太太冲着我们鞠躬：小同学，给点吃的吧，实在饿坏啦。有些学生是一边吃着饭一边来上学，手里还有半个馒头或火烧之类

的，马上就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赶紧给小女孩。然后一边流眼泪一边继续鞠躬：谢谢小同学，谢谢小同学，谢谢大哥哥大姐姐。可那小女孩两手抓着馒头火烧，嘴里满满的。噎得又伸脖子又瞪眼，像公鸡要打鸣。我们特受不了穷人的感激。赶紧继续搜索吃的。我看见刘力走过来，立刻冲过去。那小子早上老吃好的，糖包，枣馒头，糖火烧，都是从机关食堂买的。我爸爸妈妈也在机关，可很少给我买好吃的，早上老是棒子面粥，馒头咸菜。所以我特眼馋刘力，可还得装出一点不馋：看都不看他，今天可有理了，我上去就把他的半拉糖包夺下来，他刚瞪眼我就理直气壮的说，穷人都饿坏了！刘力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好气哼哼的四处张望。谁有吃的立刻扑上去，高年级的他也不怕，只要说是给穷人的，没一个人说不。那老太太一会儿功夫就捧了满满一草帽吃的，还不停的鞠躬，我们心里舒服极了，就没一个人想过：本来应该在旧社会的穷人怎么跑到新社会来了？

那三年困难时期老觉得肚子饿。老师上课说，咱们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虽然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胸中立刻冒出一股自豪，肚子马上不饿了。老师又说缺粮食不光是自然灾害，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我们心中的豪气继续膨胀，不光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刘力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赶紧问：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刘力说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看完“甲午风云”恨不得马上抄起棍子去打小日本，听完了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立刻就发誓长大非找所有帝国主义拼命。别看苏联老大哥叫了那么些年，让我们转过脸来恨他们也用不了三句话。

我们只听毛主席和党的。长大干什么呢，就仨字儿：干革命！一切都再清楚不过，还能干什么别的呢？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些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

## 【历史见证】

### 大兴屠杀调查

• 遇罗文 •

#### 一、缘起

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市大兴县屠杀事件。

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无奈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

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遇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导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幸好那里有19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份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即318布告），还应该继续遣送。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19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

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19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踩死。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那比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股杀人狂潮迅速辐射、流传到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

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的——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听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两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出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1966年8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份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份，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相信因果报应。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份。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

### 三、来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听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5级，污染程度非常严重。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人，人数最多；中心、听生各二十余人；红升行动慢一些，只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杀的公社主任高福兴、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垓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他们认为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继续之中。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非常残忍。

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

关押着 108 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 8 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

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 8 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 14 年，在“干校”的 6 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 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 8 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77 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 61 岁，“文革”那年他 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66 年 8 月 30 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

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知道自己并没有处死他人的权力，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反常。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会向大兴县过问此事。

老刘说，他们从北京回来，认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9月1日以后，县长傅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而且还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

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

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

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据他说，67年王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份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他家绝对逃脱不了。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听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

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次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份，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份”。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人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

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我们会解开这个迷团。

□ 原载《民主中国》2001年03、04期

~~~~~

【研究报告】

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革屠杀

• 一 平 •

一、发生在边缘的暴行远为残酷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五进马村劝停杀》（张连和）、《大兴县屠杀调查》（遇罗文）和《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章成）。《北京之春》发表的吴若愚《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也应该重视。此数篇文章可作为一专题联系起来考察。

毛后人们讲述文革主要是个体经历，对象多是知识分子、知青和干部，背景主要是城市，包括他们劳改下乡所在地，综合调查研究的则不多，特别是对农村、边远地区关注不够，这是欠缺。文革中的农村、边远地区之被忽略，主要是农民没有记述的能力，而且也没有言说的机会和权力。文革后知识分子、干部、知青尚未能走出自身困境，因此对农村、边远地区发生的事情难于顾及。毛后北京有成千上万流落街头的上访者，但他们的申诉大抵是销声匿迹。更主要的是研究阐释文革在中国一直都有禁忌，许多重要的资料至今仍作为机密被封存，很多重要的事情也不允许公开报道，因为涉及历史及内幕，有动摇政权的危险。78年后胡耀邦主持文革平反工作，政策是“水落石不出”。（王友琴《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人民日报》曾发表纪念刘少奇的文章，但删掉了监禁中刘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直到死亡的细节。胡绩伟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此自有政治的理由，但却给中国留下了思想的空白，使民族的历史记忆发生中断。近3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少有有力的文革学者和著作，而海外不少有价值的记述、研究和思考又不能公开于大陆，比如郑义先生的《红色纪念碑》、王友琴女士主办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宋永毅先生的《文革大屠杀》等；《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中共机密文件记录的文革广西大屠杀》等重要的文献也都是发表于海外。对于中国这些是历史的损失。

文革起于北京，集中于大城市，但蔓延到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却更为残酷。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记述：“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

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此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大兴县屠杀调查》、《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及《红色纪念碑》记叙的事情相一致。当然这些在文革中是极端的事情，但类似的事情在其它地区也还有，比如刘国凯先生提到“广东的海南、梅县地区的大屠杀并不比道县逊色”，宋永毅先生《文革大屠杀》中有“内人党大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云南沙甸事件”的记叙。此说明文革中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暴行远比我们了解的普遍、残酷。

二、掘根

在农村建立共产党基层权力组织、土改、合作化，此三件事关系重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颠覆。共产党说：这是铲除“三千多年封建势力”。土改是严酷的暴力过程，“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估计，在土改中被处死的地主达100—200万人。土改以残酷暴力消灭了中国的乡绅阶级，因为“唯有彻底推翻绅权，（共产党）才能在农村建立强大的治权”。消灭乡绅阶级，也就消灭了中国儒家正统伦理秩序的承负主体；其颠覆了“祠堂政治”，中国延续数千年稳定的有机秩序——家族社会——也就即完结。而共产党一旦巩固了权力，就强制性向农民收回土地——合作化。此对中国是掘根之举。“民有恒产而有恒心”，消灭土地私有，即断绝了农民的自主和依靠，中国文明由此丧失了根基。美国、日本之花大量的资金补贴农业，不仅是出于经济，其有维护文明传统的意义。而中国却反之而行。作为农业国家，没收了几亿农民的土地，整个民族就失去了心理的稳定和精神的依据。而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家族的依靠，加上户籍管制，即沦为国家的农奴。这是由土改至邓改革，中国农民的实际命运。我们批判中国封建制度——是的，其有残酷性，但取代它的是什么？公社取代了家族、书记取代了乡绅族长、毛崇拜取代了祖先、阶级斗争取代了孔孟之道。我们可以批判后者专制落后，但其是文明，有人文价值，提供人性和睦共存；而前者则只是政治统治。共产党消灭了中国农村的中坚乡绅阶级，消灭了土地私有，摧毁了乡村秩序和道德伦理，由此中国农村的文明彻底颠覆。不破不立，铲除了农村“三千多年封建势力”，填补文明空缺的是什么？是暴力强制和人民公社的神话，而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三年大饥荒。然而，中国农民的不幸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文革中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发生残酷的屠杀，有毛和共产党的历史背景，是其政治传统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国农村文明的彻底破坏，而人性普遍回至荒蛮；是阶级斗争的主导，使暴力屠杀具有合法性；是共产党的在农村的暴力传统——由农运到土改，使文革中农村再次发生血腥杀戮。不错，中国民间始终蕴有残酷的原始暴力，但其在日常是平静、顺从和充满忍耐的，只有在社会崩溃、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才会爆发。不能说文革比太平天国、明末、汉末更残酷。但是文革不是社会的自然崩溃、人民自发造反。为什么三年饥荒，中国农民没有造反？为什么文革时期没有了饥荒，农村反倒发生残酷暴力？显然，这是毛政治的结果。

三、毛启动了原始暴力

张连和回忆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记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遇罗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记：66年8月31日晚，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组织干部开会，传达了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谢富治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显然屠杀不是农民的自发造反，其后有“最高指示”的精神。谢富治曾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会议，指示“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记录文献中我们看到，导致大兴屠杀有三重原因：1、毛的革命号召和舆论鼓动；2、全国红卫兵暴力风潮；3、恐怖气氛：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要先下手。这说明农民本没有“造反”的要求，也未曾要杀人，他们是由于此三重原因而走向屠杀。

农村屠杀主要是杀“地富”和其家属，此和城里红卫兵打击“黑五类”暴行一致。但和城里不同的是，城里运动的重点是群众造“走资派”的反——民众反政府权力，特别是基层权力。从66年6月到67年初，城里（包括县城）各级政权普遍瘫痪，领导干部皆被揪斗，此和毛发动文革的旨意基本一致。但是在农村，文革初期农民没有造村队支部的反，不是农民斗争村队领导，而是党的基层权力领导组织农民杀“地富”。此很重要。经土改、合作化，加户籍管制，中共对农村的统治非常牢固，农民由经济到意识、到人身被彻底控制，且封闭于分散的自然村落，他们完全丧失反抗能力，即使毛叫他们“造反”，他们也没有意识和能力反抗“党”的政权。这也就是三年饥荒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农民暴乱的原因。再，经合作化中国农村近乎集体农奴制，占有者是国家，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农民共同受国家奴役，他们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不大，前者仅类似于工头，故彼此间的对立没到造反的程度。还有农村的“斗争”主要体现于贫下中农对“地富”专政，虽然“地富”早已是死“老虎”，但此标签化的阶级斗争转移了农村的困境和矛盾，农民可由之发泄怨愤，其产生的恐惧又使农民驯服。由于这几重情况，文革到了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便成了“党”干部领导农民杀“地富”。

首先是毛的“革命”号召：“党”农村的权力经土改而建立，杀“地富”是之传统，毛“革命”指令下达，其革命经验记忆被唤起，于是杀“地富”的行径重复发生。此体现了指令通过经验记忆对行为的支配。再，红卫兵运动的潮流：农村杀“地富”是农民对红卫兵运动的潮流的追随，也是对红卫兵杀“黑五类”的模仿。农村消灭了乡绅阶级，传统伦理崩溃，自身即失去重心，其价值、意识、行为方式受中心城市影响和支配。这本是工业文明中的普遍问题，但毛在首都将红卫兵“革命”确立为崇高价值，农村对之追随模仿，其自然就是杀戮。红卫兵暴力运动和相应的舆论宣传，使全国笼罩于恐怖气氛中，“红八月”、“红色恐怖”是当时的赞语。农村屠杀的直接原因来于此恐怖感。恐惧，套上简单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有了具体的恐惧对象和敌人：“地富”，并且长期对“地富”的迫害杀戮，使迫害者对被迫害者有恐惧感：于是即有“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革命”赋予了人民暴力杀戮的权力。这些杀戮实际是共产党农村革命的再重复。只是这一次，其没有革命的实际意义，只是形式上历史记忆的重复。文革中国农村的暴力杀戮从任何角度都无必要，于中共统治农民无必要，也没有农民反抗政府权力的意向，并且它和毛发动文革的目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并无关系。其只是盲目的暴力，由于毛的“革命”号召，和红卫兵运动潮流的影响以及自身的恐惧。

和中心城市比较，文献中所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杀戮属于集体屠杀。以北京市为例，“红八月”40余天红卫兵杀害1700多人，手段甚残忍。总体而言，此为残酷屠杀；但具体每一个案，受害者多死于群众无节制暴力虐待，残酷甚残酷，但其没有“处死”的明确意识，也没有事先的组织计划，虽然发生有数人同时殴打致死，但因为缺乏“处死”的明确意识，也就没有“杀”的组织和计划，并未成规模，因此也还不算集体屠杀。

但文献中所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杀戮有明确的“处死”的意识，且有事前的组织和计划，且而成规模：十数、数十、甚至上百地成批处死。因此这些杀戮是集体屠杀。比如北京大兴县大辛庄公社的杀戮，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事前对各大队干部有明确指示：“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湖南、广西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开处死“地富”，最可说明农民杀“地富”有明确的“处死”意识。湖南“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共杀人1054人，全区平均50人中就杀了1人；……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这是屠杀的组织性、计划性。广西“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这是典型的集体性。遇罗文记：大兴“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此也是红卫兵不能做到的。集体屠杀是文革中农村和边远地区暴力杀戮的显著特点。

暴力在文明中的意义是维护生命、维护人文价值和传统，否则就是反文明。文明限定使用暴力的规则、程度、方式和手段，此体现文明的程度。这是文明和暴力的两条根本的关系。文革在此两点都极度反文明。文革间中国的杀戮多是“政治”暴力，就是说人们带有一定的政治观念、目的、信仰去实行暴力攻击，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虽然是“虚假”的，但人们认为其“真”。由于暴力假以意识形态，其也就具有了“真理”“道德”“价值”意义，因此无论其如何残暴、反人道，但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中被肯定，这也就是文革中人们狂热地去迫害杀戮的原因。而文革更残酷所在是取消了使用暴力的规则、取消了限定使用暴力的程度、方式和手段，特别是毛将暴力权力交给予民众，由是暴力的使用也就被推到极限。这是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也是文革暴力之残酷的原因。

由于暴力合法化，由于暴力没有了底线，由于暴力权力交给予民众，也由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落后，某些区域便产生了比红卫兵更残酷的杀戮。中国民性中一向蕴有深厚的原始暴力，而农村甚于城市，边远地区甚于中心地区。其在平时处于休止状态，而一旦社会混乱便爆发出来。中国有残酷杀戮的传统，其在历史上周期性发生，“千刀万剐”“食肉寝皮”不为空言。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农民造反和官府镇压之残暴杀戮有丰富的记载。近有土改、农运、412、马日事变，远有太平天国、张献忠、汉末。文革再次启动了中国的原始暴力，其体现于农民的盲目屠杀，也体现于边远地区民众造反和权力的残酷镇压。吴若愚记叙：广西“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史无前例”倒未必，但腥风血雨，残忍万状则属实。郑义先生的《红色纪念碑》见证了文革将人性带入残暴野蛮的极致。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文革启动了中国的原始暴力，但是中国暴力之野蛮之残暴并不是毛和文革的特殊创造，只发生于文革，其于中国有渊久的传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部分，无论是民众造反或官府镇压，其都同样残酷。经济上过分的贫穷艰困；统治者过分的压迫掠夺；封闭，教育文化不足；权力过于集中，以至争夺残酷；加之家庭血缘崇拜（灭族及产生于此），此数重

原因是中国残酷杀戮史的根源。在我们批判毛、文革的同时，也应该有对民族暴力历史和民性的反省和思考，毛和文革是其于特别历史情况下的特别呈现。毛的罪责是启用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野蛮的暴力，给其以合法之权力。

03年11月—04年1月 于伊萨卡
□ 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02期

~~~~~

## 【动态报道】

### 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文革”摄影展览和画册编辑追记

• 江 融 •

历经三年精心策划、编辑、撰写和制作的大型摄影展《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于2003年6月26日在法国巴黎摄影遗产博物馆隆重开幕。该展览由法国文化和交流部主办，由该部建筑及遗产局和美国联系图片社（Contact）共同承办，展期从6月27日对观众开放至9月28日结束。该展览是中国新闻摄影家首次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举办如此规模的大型个人摄影展。因此，在法国引起了轰动，展览开幕之前，共有30多家法国和欧美主要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在近十天的时间里分别对他进行采访，这些媒体高度评价李振盛在“文革”这段充满暴力和动乱的年代中，冒巨大危险从官方和非官方的角度，拍摄并珍藏了近3万多张底片，反映了文革各时期的画面，表现出一位新闻摄影家的敏锐和艺术家的眼光。

配合该展览还同时推出摄影画册《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心路历程》（Red-Color News Soldier）法文版，该画册的英文版于2003年10月中旬起，先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推出。到目前为止，《红色新闻兵》已出版发行了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版本，另外十几种语文版本正在陆续出版。该摄影展和摄影画册是中国著名摄影家李振盛从“四清”到“文革”十几年拍摄的精彩作品的结晶。2004年最新一期《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选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并列榜首，这是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该杂志主编特地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红色新闻兵》画册，称赞它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认为它已成为“20世纪最凶恶时代之一的历史见证”。

## ◇ 缘起北京

该展览和画册是由曾经作为世界五大图片社之一——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与李振盛和笔者在三年前共同策划，但缘起于1988年。当年三月份，李振盛20幅“文革”组照在北京举办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获得“系列新闻照片大奖”，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称赞李振盛：“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之后，这些获奖照片随同“中国新闻摄影50年”大型摄影展，先后到比利时、波兰和前苏联等国家展出。普雷基在欧洲看过这个展览，对李振盛的照片印象深刻。

普雷基碰巧于1988年11月率领一个由世界著名摄影家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先是参加上海“国际摄影节”，然后，在北京举办“新闻摄影周”，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摄影师参加，笔者当时应邀担任普雷基的翻译。摄影周期间，组织了内容丰富的摄影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并在首钢、仪仗队、寺院等地进行实地拍摄，然后进行讲评。同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联

系图片社新闻摄影十周年——越南战争以后的新闻摄影》和《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两个大型摄影展，观众等待进场参观的人数之多，一直排队到天安门广场，并发生将展板挤倒的现象，该摄影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摄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北京期间，普雷基特别要求会见李振盛，在观看了他的60幅照片之后，称赞李振盛“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记录了一个时代。”

#### ◇ 重逢纽约

1989年，笔者来到联合国工作，与普雷基在纽约重逢并保持联系。《纽约时报周刊》在1996年5月“文革30周年”之际以4页篇幅发表了李振盛纪实照片，同年10月，李振盛应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到这两所名校举办“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幻灯放映和演讲会。1998年11月，经朋友介绍，笔者认识李振盛教授，并邀请他到联合国中国书会举办“黄河文化”幻灯放映演讲会。1999年8月，我有幸与他一道结伴去西藏旅行摄影，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商定设法通过普雷基将他的照片以展览和画册形式推出。与此同时，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普雷基正在寻找李振盛，希望能使用他的一些“文革”历史照片，因此，在笔者的联系之下，普雷基与李振盛在分别了12年之后，再次于2000年在纽约重逢，在看过李振盛从国内带来的大量“文革”底片之后，他决定作为李振盛作品的全球总代理，并开始共同策划这个展览和画册的项目。

接下来的三年里，普雷基为该项目组成了一个编辑组，其中除他本人、李振盛和笔者之外，又邀请在联系图片社工作的美国记者雅克·蒙纳斯（Jacques Menasche）以及李振盛的女儿、曾经担任香港《文汇报》政治新闻首席记者李笑冰参加，开始进行大量的编辑和访谈工作。只要普雷基在纽约期间，大家都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在一起共同挑选底片，讨论编辑策划方案，经常工作一整天。2002年夏天，在普雷基领导下，我们共同将李振盛数以万张的“文革”底片分门别类，普雷基用放大镜反复仔细地观察每张底片，从中精选1000余幅照片，构思和编辑该展览和画册。与此同时，蒙纳斯与笔者对李振盛进行采访，通过笔者在两种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协调、沟通和翻译，先后共进行200多小时的访谈，在此基础上，为李振盛撰写了自传体的回忆文章。最后选定由具有八十年历史、以出版艺术类画册享誉全球的英国菲登（Phaidon）出版社出版此书，并决定先从欧洲开始进行全球巡回展，而且选择法国作为欧洲十多个国家巡回展的第一站。

罗伯特·普雷基担任过2001年第44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国际评选团主席，根据他30多年从事新闻摄影事业的经验曾说过：“巴黎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因此，李振盛的影展选定在巴黎首展，法文版画册在巴黎首发。只要能感动巴黎，就会感动世界；只要能轰动巴黎，就会轰动世界。”

#### ◇ 历史的巧合

李振盛摄影展将法国作为第一站，既是历史巧合，又十分贴切，至少有三个理由。

首先，李振盛是学电影摄影出身，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大学期间，他先是学习电影摄影，后改学新闻摄影。法国既是摄影术的诞生地，又是电影发源地。1826年，法国人约瑟夫·尼舍福·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epce）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后来，达盖尔与其合作，发明了摄影术。法国人卢米埃尔（Lumiere）兄弟共同发明的奥托克罗姆干版和李普曼彩色干涉工艺，对彩色摄影的发展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发明了第一部商业用途的电影放映机，对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李振盛的全球摄影巡

回展在巴黎首先展出，是对摄影术和电影发明术的一种特殊的致敬。

其次，作为新闻摄影家，李振盛的摄影展特别选在新闻摄影大师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诞生国首先展出，原因是李振盛与布勒松两位摄影家之间的确有许多可比之处，例如，他们从小都受过绘画训练，曾立志成为画家。他们都曾学过电影摄影，因此，都喜欢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拍摄一个突发事件的连续画面过程。

与布勒松有30多年交往的罗伯特·普雷基，为编辑策划李振盛的画册及影展，三年里看过李振盛上万张“文革”底片，他曾说过：“李振盛与布勒松在摄影艺术追求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他们都共同致力于纪实摄影，拍摄时特别讲究原始构图美，都喜欢拍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系列组照等等。两个人语言互不相通，两个人年龄相差两代人，两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天壤之别，可他们的艺术理念是相通的，艺术追求是相同的，他们在不同时空、不同国度从事纪实摄影，都在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拍摄黑龙江省长李范五被“剃鬼头”全过程的组照，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这些照片与布勒松1945年在德国拍摄到一名曾与盖世太保同居的女人在战后被民众羞辱的画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振盛拍摄的被批斗者面对一大批观众的画面，与布勒松1948年在北平拍到的一名警察面对一大批民众的照片十分相似。1949年布勒松在上海记录学生和民众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照片，背景也是使用巨幅毛主席肖像，乍看上去类似于李振盛在“文革”时拍照的许多构图。

更关键的是，他们俩人都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不仅目睹历史的发展，而且用镜头记录了历史的碎片，由这些众多的碎片组成了一卷历史的画册。布勒松在1948年12月解放军进城之前，在北平停留了12天，然后在解放军打过长江之前，到达国民党占据的南京，拍摄到国民党撤退的情形，之后又去上海拍摄了民众的恐慌，把中国人当时的贫穷、落后、木讷和昏庸状况展现在镜头之中。

1960年李振盛在长春电影学院读书时，曾经将布勒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公开场合都要故做严肃批判的姿态，但暗地里对布勒松的作品和摄影理论倍加赞赏，也作过许多研究。至今他仍保存着43年前写过的一份批判布勒松的原始材料。所以，他在拍摄过程中，也采用了类似于“决定性瞬间”的办法，捕捉了不少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因为电影出身，他的构图完美，这次他的画册采用的285幅照片和影展中的152幅照片，均未进行剪裁，保持原始构图的效果。

同时，他也有凭直觉拍摄到的许多“文革”期间除批斗、武斗之外的百姓生活和生产的画面。另外，李振盛从小酷爱电影，在中小学及读电影学院期间，受苏联电影的影响很深，因此，在他摄影作品中，能感受到历史事件大场面的气势，以及局部细节包括人物面部表情的心理表现。

最后，李振盛展览在巴黎首展的意义，还在于1968年至1969年，全世界都掀起学生运动的风暴，而这场风暴的起源应该说随“文革”的爆发而蔓延全世界，当时从1968年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学生的反战和罢课，到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一直到1969年日本学生占领象征体制和学术权威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安田讲坛。这些运动中的许多学生都是自称为“毛派分子”，尤其是1968年5月6日，巴黎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Sorbonne），与政府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后引发全国工人大规模罢工的革命，因其发生地在巴黎塞纳河的

左岸，史称“左岸运动”。据了解，在参观李振盛“文革”摄影展中的许多观众，都是当年法国的“红卫兵”，不知在经过30年的人生经历之后，当他们看到曾崇拜过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的历史镜头时，会作何感想？

#### ◇ 历史的记录者

1963年，李振盛到《黑龙江日报》担任摄影记者，当时还不满23岁，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踌躇满志，血气方刚，他参加了“文革”序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他作为专业摄影记者的生涯始于“文革”历史的萌芽期，加上他对新闻的高度敏锐、专业的严格训练，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强烈愿望，以及对工作的细心严谨，都使得他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有心人”。他的导师——吴印咸曾对他说过，“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之中决定了李振盛将成为“文革”历史的记录者。

他在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之前不久，从参加“社教”所在的农村返回报社，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时，他也相信这场革命是正确的，所以使用“正面”的角度，按照报社领导的要求，去完成拍摄任务。然而，当他看到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被夷为平地，看到中国北方名寺——极乐寺珍藏的佛经被付之一炬，他开始暗自疑惑了：这不是在“革文化的命”吗？接下来，看到省长李范五和省委书记任仲夷等人被造反派批斗，两派对立的造反派学生之间停课武斗，许多革命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被枪决，他开始将镜头转向这些“负面”的场景。

当他发现佩戴“红卫兵”的红袖标，能使他更自由拍摄这些场面时，他在报社与其他几位年轻人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并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授予印有毛泽东手迹的“红色新闻兵”袖标，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拍摄到造反活动的各种事件，在“文革”极为激烈的头三年中，拍摄到大量难得的历史资料。1967年1月大夺权风暴中，他所在的“红色青年战斗队”受到哈军工等院校红卫兵的支持，成为报社的掌权派，他也成为报社革委会的常委，一年半之后，他又被省革委会派到报社的干部和支左的红卫兵所打倒，并被批斗，然后送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柳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期间，他仍然找机会拍摄周围的情况。林彪出逃身亡的事件发生后，他从干校又回到报社摄影组工作，并被提拔为摄影组组长。在“文革”后期，他又拍摄到许多珍贵的镜头，包括西哈努克访问哈尔滨、“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样板戏，毛泽东去世的追悼活动，以及“四人帮”被打倒后老百姓欢庆的情景。在“文革”结束之后，又拍摄到王守信被枪决的过程，作为《红色新闻兵》画册的尾声与后记。

#### ◇ 历史的观照

2003年正好是中法文化交流年，10月正式在巴黎开幕，7月5日在阿尔勒举行的摄影节也是以中国为主题，共有约20位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参加。2003年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和摄影展，规模也是空前的。因此，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前，法国人有机会看到李振盛“文革”摄影展览，使西方人对中国近代史上这段仍然不太了解的历史，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情况，通过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记录十分完整、真实的照片，能有一个历史的观照。这个展览和画册项目的宗旨是，尊重历史，尊重摄影和艺术，兼顾“正面”和“负面”的照片，以纪实性的历史镜头摆放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反思“文革”这场人类大灾难的起因、后果和教训。

该画册的法文版书名定为《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本书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印在画册首页。耶鲁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专家史景迁为画册撰写了前言，另外，美国记者雅克·曼纳斯(Jacques

Menasche)和笔者在三年中对李振盛作了长达200多个小时的访谈,曼纳斯执笔撰写了3万多字的李振盛口述自传体回忆录和介绍“文革”不同时期的概况贯穿在画册的各章节之前,为人们了解“文革”提供了一个中国摄影家作为目击者和记录者的第一手资料。

李振盛在其画册和展览项目开始时表明,之所以希望将这些寻常百姓的故事,以及保留了30多年的照片公诸于世,目的是“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李振盛所拍摄和收藏的几万张“文革”底片,将会成为历史的宝贵资料,李振盛的摄影展能在法国摄影遗产博物馆首展,并在世界巡回展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即使今后人们或许不会记住这位曾被美国《纽约时报》周刊称为“当今中国英雄”的姓名,但他拍摄的这些历史照片将会永存。

该影展目前正在意大利展出,并将陆续到已签订展览合同的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荷兰、瑞士、瑞典等15个欧洲国家巡回展出。同时,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有25个国家博物馆已签约或预约展出该影展。

为配合签约展览的国家不断增多,并加快巡回展览的进程,该影展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特别赶制了5套影展作品,可同时在世界各国交叉巡回展出,并将原定的三个月展期缩短为两个月,这样仍需8至10年方能结束预定的展出。

(编者注:本文作者系《红色新闻兵》展览和画册项目总协调人,并参与该展览和画册的编辑及翻译工作,现任联合国摄影协会主席。原文有所删节。)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